



“我见证了我的城市灭亡”

来自伊拉克、叙利亚与也门的城市冲突前线的声音



这篇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的特别报告探讨了三个中东国家中的现代城市战争导致的毁灭性的人员伤亡。





我见证了的城市灭亡；我目睹了同胞们的死亡；我看着自己崩溃。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好好活着，但我希望如此。

——29岁的萨米从阿勒颇逃到大马士革，之后逃到贝鲁特

一位指挥官告诉我，战争有时会变得异常白热化，他会在厨房与客厅里的敌人交火，而楼上还有平民住户。

——美国公共电视网与《卫报》联合出品的纪录片《摩苏尔战役》的导演兼制片人
乔舒亚·贝克

因为没有食物，人们只能从垃圾堆里找吃的。我们曾见过妇女们用树叶给孩子煮熟汤喝。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门塔伊兹代表分处主任南希·哈马德

暴力冲突爆发后，我们没了工作，失去了一切。现在我不得不借钱给孩子买牛奶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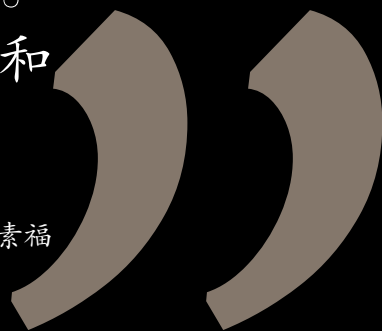
——一名伊拉克的10个孩子的父亲，2014年从辛贾尔镇逃离，从此居无定所。

炸弹、迫击炮和子弹从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邻居们都逃走了。真是太可怕了。

——摩苏尔居民描述他和家人逃离家园的情景

我当时正在吃早餐。我正喝着茶，突然就发生了爆炸。弹片顿时击中了我的双臂和双腿。

——摩苏尔居民尤素福



序 言

战争回到了城市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这篇新报告生动地展示出我们见证着武装冲突历史的深刻变革：在城市和乡镇当中，城市战一旦爆发，便会陷入固定模式，即持续数年。政府军和非国家武装团体运用混合作战方式展开巷战，包括空袭、炮轰、智能武器、步兵突击、自杀性炸弹袭击、汽车炸弹和简易爆炸装置。平民被困在所有这些战争行为之中。

自古以来，攻打和抢掠城市的行为都会导致居民极度恐慌。在历史上，如果防御部队的指挥官拒绝接受投降条件，那么平民居民就会惨遭抢掠、强奸、杀害、残害和奴役。很多人宁可选择自杀。

然而，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和20世纪初期，似乎老式的围困和城市战已经成为历史。军官们更倾向于在空旷地带施展“兵法”。他们担心，如果在城市里打仗，他们的士兵会逃跑、不守纪律和酗酒。普通士兵在各种战术和训练中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适合在城市战争中作战。

在19世纪初期，多数的应征士兵都是来自农村社区，几乎都没有见过大城市。到1914年，19世纪末的国内移民让欧洲各国首都人口激增，提供了大量的“可支配的男性”——美国学者爱德华·卢特瓦克的措辞。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城市战仍旧非常少见，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首个重大现代案例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其残酷场面难以言说。日本帝国军本能地采用了恐怖政策来弥补其相对人数弱势，但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没有被击垮。

1939和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华沙和鹿特丹这些城市遭到了疯狂轰炸。但在欧洲西部战场，城镇都被拱手让给了敌方。1940年6月11日，温斯顿·丘吉尔在铃兰堡敦促法国总参谋部采用巷战战术以保卫巴黎。这个想法让魏刚将军和贝当元帅倍感震惊，后者曾在西班牙担任过大使，对激烈的巷战有所了解。

在二战期间，以纳粹国防军所谓的闪电战著称的运动战最终演变成城市战——塞瓦斯托波尔、沃罗涅日，然后到斯大林格勒——尽管希特勒也曾想让他军队远离城市。在斯大林格勒，也就是红军扭转了战争局势之地，战斗非常残酷。有约1万名平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战争的废墟中存活了下来，他们中有上千人是孤儿。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一名援助工作者如是描述他们：这些孩子或者十分狂暴，或者精神紧张。

希特勒眼看战争局势急转直下，但为了自己的声望，他拒绝放弃城市。随着红军及其西方盟军抵达德国边境，他下令每座城市都变成一个堡垒——特别是柯尼斯堡、布雷斯劳和柏林。由于每座城市都遭到猛攻，被困平民的命运有时会让人联想到欧洲黑暗时代。

柏林战役是大量征召部队之间在欧洲展开的最后一次重大城市战争。经过一场长久的战争，德国和日本军队在1945年被彻底击溃。他们的城市被盟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部队完全损毁，其损毁程度是人们在此前无法想象的。经过数年的极度疲惫、饥饿和战争冲击，平民和士兵都已经沦为行尸走肉。据估算，有1200万无人陪护儿童在欧洲各地流浪，他们仅仅是更大数量的流离失所民众中的一部分。饥饿、贫困、无家可归、疾病、丧亲以及家庭离散是欧洲、亚洲和苏联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的共同经历。

如今，城市中的平民再次陷入战争之中——被困、受伤、饥饿、穷困、被劫为人质、被当作人肉盾牌，且经常无法逃离。诸如水、电、医疗救护和教育这类必不可少的城市服务遭到破坏或损毁，有时是遭到蓄意攻击。古代的围困战略又被再次采用。在新型的旷日持久的城市冲突中，不仅有地道、地雷和狙击手，还有现代化的无人机和数字化战争，看起来像是未来数年的新常态。

这些新型城市战争可能会每次都持续数年而没有结果，这是由于武装团体如今都藏身于城市而非丛林，且游击战从根本上转移到了城市。各方都无法取得胜利，导致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活长期受城市冲突影响。

我们已经到了战争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在本报告中，通过平民的声音对此做了很好的描述。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战争已经表明，未来的主要战场将不会在开阔地区，它们将在各个城市和乡镇里。

——安东尼·比弗爵士

军事史学家，著有《斯大林格勒》与《柏林：1945年的陷落》

1	2	3
拯救我们的城市：紧急呼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东及中东行动部主任罗伯特·马尔迪尼对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现代城市冲突的介绍。 第11页	十项建议 采取紧急行动以防止或缓和城市战争导致的人类苦难。 第18-19页	“我的儿子窒息而死”： 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的故事。 第20页
		亚西尔的故事 “大楼倒塌了。他没能逃出来。” 第21页



4

“追忆一座曾生机勃勃的城市”
也门原文化之都塔伊兹的故事。

第26页

哈南的故事

“那一天，我的生活戛然而止。”

第29页

7

“我看着自己崩溃”

除了身体上的伤害外，旷日持久的城市冲突还会造成非常真实且持久的心理创伤。

第60页

5

“无论你往哪儿看，都有人想杀你”

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故事。

第30页

穆罕默德的故事：

“尽管人们自身处境艰难，但他们还是收留了我们。”

第36页

8

“我不会忘记，但我会试着原谅”

黎巴嫩内战主要是城市战争，这些发生在人口稠密且极其多样化的城市地区的冲突让当地民众付出了各种惨痛代价，给人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复兴城市社区，远不止重建建筑物。

第64页

“我为什么不参加战斗来保卫我的家人？”

一名前战斗员讲述他的战争与和解经历。

第71页

6

城市战争的混合影响

“在地下生活”

与世隔绝，挣扎求生。

第40页

阿马尔和拉妮姆的故事

逃离与回归陷入战争的城市。

第44页

“如果我们当时留下来，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逃往、逃离或滞留在陷入战争的城市。城市地区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不为人知的故事。

第46页

“我们的目标：确保供水保持中立”

城市内部和周边的战争破坏了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服务网络。

第50页

冲击波

在城市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第54页

化学武器

尽管化学武器被绝对禁止使用，但仍不断有相关指控频繁出现。

第56页

致命遗留物

即便战争已经结束，未爆炸武器仍会造成民众死亡。

第58页



2016年12月，也门塔伊兹。两名儿童在一辆满是弹孔的汽车里玩耍。

拯救我们的城市： 紧急呼吁

作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东及中东行动部主任罗伯特·马尔迪尼

一位年幼孩子的母亲失去了她的丈夫，他是在外出为家人寻找食物时中了狙击手的子弹而丧生的。

一位4个孩子的父亲在火箭炮落在他们家院子里时，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和一个孩子被炸死。一名指挥官描述他的士兵们不得不展开巷战时的场景，当时那些住户都躲在家里。

这些故事代表了当今的城市战争。它们构成了这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别报告的核心内容，该报告从历经冲突之人的视角探索了中东地区的城市冲突导致的长期累积效应。

经历深重苦难的普通人——一名牙医助理、一名教练、一名木工、一名由学生变成的战斗员，以及其他——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年代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挑战：武装冲突的城市化。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加上军官、水利工程师、救济工作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们给出的深刻见解，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战争每天为民众造成的恐惧有所了解。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各个城市——阿勒颇、霍姆斯、摩苏尔、费卢杰、拉马迪、塔伊兹——都有重要的故事要讲。叙利亚阿勒颇市曾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学术、音乐和贸易中心，在战争爆发前曾是该国的经济中心。如今，它的老城部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损毁，人口减少，精神、文化和经济生活已经不复存在。“我见证了的城市灭亡”——这篇报告的标题——是一名年轻的音乐家描述他深爱的家乡的转变时所说的一句话。由于不断遭到轰炸，加上他经常被各方战斗员逮捕并虐待，他最终选择逃离了这座城市。

伊拉克摩苏尔市曾因其包容及各种宗教与文化的混合共生而著称。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在遭受15个月的围困前曾是一个工业、咖啡生产和学术中心。¹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被战争摧毁——或是正在被摧毁，这些战斗通常就发生在他们的家门口或商店门口的街道上。

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其他各个城市的许多民众也有类似的故事要讲。



截至2015年底，伊拉克拉马迪已经有80%的建筑物被损毁。

城市苦难升级

2010年至2015年间，全球与战争相关的伤亡人数中，约一半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²在这些国家里，城镇战争从未间断。尽管城市战争及其导致的苦难并非新鲜事，但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看到的这种战争已经变得太司空见惯，而且太具破坏性。它导致了深深的积怨，这种积怨有可能引发暴力循环。平民的伤亡率特别高：据估算，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92%的伤亡人员是平民，与之相比，在其他地区使用这类武器，伤亡人员中平民的比例是34%。³

为什么伤亡人数如此之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普遍缺乏对国际人道法（也被称为武装冲突法）的尊重。这一法律体系保护不参与或不再参与敌对行动的民众，并对作战方式和手段加以限制。从本

质上说，它旨在限制武装冲突的影响，让战争保留一些人性。然而该法正在遭到践踏。平民和民用建筑物（如医院和学校）正在成为攻击目标。普通民众身陷围困当中。各方均未始终注意保护平民居民。这些后果都是毁灭性的。

另一个原因是武器的选择以及这些武器在人口稠密地区的使用方式。尽管在20世纪的某些冲突中使用的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在21世纪越来越少见，但对平民区的空袭和重型火炮轰炸仍旧是现代战争的标准特征。

此外，出于多种原因，现代城市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还未找到，这意味着民众将会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一次次成为根深蒂固的暴力局势的受害者。

当今发生在中东地区的城市冲突也有众多武装部队和团体参与，很多国家政府给他们提供支持。这让和平建设和援助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与此同时，一个古老的战争形式——围困——又卷土重来。武装部队和团体不愿冒生命危险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作战，因此他们现在采用围困的方式。围困方和被围困方都将平民置于危险之中——危及到他们的生命、幸福和尊严。平民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有些民众被围困的时间比历史上的列宁格勒和萨拉热窝围困还要长。有鉴于此，如今在中东地区实施的围困是不合理的，且通常是违法的。

最后，伤者和患者通常无法获得所需的医疗救护，也导致了相当多的人员伤亡。医院遭到攻击，很多医院缺乏正常运转所需的医务人员、医疗用品和药品，更别说满足巨大需求了。

“我还记得孙子被压在废墟下的情景。我们设法把他挖了出来。当时他还活着。但是由于附近没有诊所和医院，一小时后他离开了人世。”

阿卜杜勒拉赫曼站在废墟旁，2016年12月初，他的四个家人就死在这里。当战事升级，前线向他们逼近时，阿卜杜勒拉赫曼一直在阿勒颇东部照顾着260名老人和脆弱的成年人。就在叙利亚红新月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进入该地区撤离患者、老人和其他平民的两天前，他的一些亲属去世了。



城市迁徙

难怪当时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逃离了他们的城市。到2015年底，据估算有大约6500万民众因冲突或被迫害而沦为流离失所者。⁴他们中的多数人还留在本国境内，那里的人道援助需求巨大。最近的估算表明，当前的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占了这一流离失所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一，⁵仅叙利亚战争导致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就占了六分之一。有超过600万叙利亚人目前与亲属住在一起，或是住在叙利亚境内的临时避难所或收容社区里，有超过500万民众已经离开了该国。⁶同样地，有超过8%的也门人⁷和伊拉克人⁸仍旧在其国内流离失所。



A. Qusay/CRC

2016年11月。民众经由库尔德村庄朱杰贾利逃离摩苏尔战争，逃往流离失所者营地哈泽尔。

不为人知的影响

在城市环境中实施攻击所导致的毁灭性影响是如此多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原因。如果供水或排污管线被炸弹损坏，成千上万的民众就有可能无法获得清洁用水，这将导致各种卫生问题，爆发传染病的几率非常大。如果医院被炸，其影响将远不止医务人员和患者不幸遇难，医疗救护机构遭到破坏。一段时间后，由于没有医疗救护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来救治患者，更多的数以千计的民众将有可能死于很容易治疗的疾病和传染病。

同时，无休止的不分昼夜的战争和轰炸导致民众被迫生活在持续的恐惧、震惊和悲痛之中。这有可能会造成创伤应激，使民众很难重建生活，坚持工作，或摆脱暴力循环。

之后就是重建的长期任务，这项任务很复杂，不仅是因为基础设施被彻底损毁，还因为在废墟中隐藏着数以百万计的未爆炸炮弹和其他武器装置。

城市战争造成的最大损失很可能无法衡量。孩子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也失去了他们的童年。整代人都对未来失去了信心。社区因创伤、不信任和仇恨而支离破碎。技能型人才都纷纷离开。太多的年轻人被卷入暴力局势当中。

这些都是城市武装冲突的现实，也是许多民众被迫逃离的原因。

2017年1月。阿勒颇国家医院遭到攻击后的受损现场。





T. Glass/ICRC

2015年4月，也门萨那。这个年轻人在法杰阿坦的战斗中受伤，面部大面积骨折。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或付出惨痛代价，或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我们需要马上采取果断的人道行动，这样终有一天，像阿勒颇那个年轻音乐家一样的民众将可以自豪地说：‘我见证了的城市重生’。”

代价太高

经历了城市战争的民众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城市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太多了。所有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被卷入这些触目惊心的旷日持久冲突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一下所有（短期和长期的）潜在损失，并立即采取行动来消除或减少这些损失。

首先，他们必须加倍努力以找到政治解决方案来消除他们的不满情绪。除此之外，交战各方必须正视战争对他们最终希望统治的人民所造成的全面影响。否则，在民众失去了如此多，遭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民众赖以生存的各种服务严重受损或成为废墟后，还会剩下什么交由他们控制呢？如果民众认为胜利者既未尊重法律，也未尊重当地居民的基本人权，胜利者还能够维持和平局面吗？

外界的支持帮助滋生了大量武装团体，使冲突影响加剧，导致冲突的和平解决更加难以实现。支持武装冲突各方（无论他们是政府军还是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各个国家政府必须利用自身影响力来维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利益。他们切不可鼓励或协助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他们必须在其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来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

还必须从过去吸取教训，并迅速采取措施来重建城市社区——确保民众获得教育的权利不受干扰，并确保为流离失所的民众提供支持——并展开全面的和解工作。这些仅仅是我们在本报告建议中，基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访的民众的陈述发出的几个行动呼吁。见第18-19页。

有了坚定一致的行动，城市及其社区就有能力恢复和重建，被损毁的居民区就能更快地恢复生机。

例如，塔伊兹有望再次让世界铭记它的独特建筑及其上等的香浓咖啡，而不是满街的垃圾恶臭。曾经发生激烈巷战的摩苏尔有望再次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文化、医学和石油生产中心。阿勒颇有望再次因其美食和音乐闻名于世，而不是爆炸的巨响和倒塌的建筑物。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或付出惨痛代价，或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我们需要马上采取果断的人道行动，这样终有一天，像阿勒颇那个年轻音乐家一样的民众将可以自豪地说：“我见证了的城市重生。”

减少损失

如今的城市冲突的规模和范围不容忽视：所有人——交战各方和支持他们的各国政府、国际社会、人道工作者、捐赠方和全世界的普通公民——都需要立即做出长期的承诺。

在所有的武装冲突中，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其他地方爆发，冲突各方的行为都受国际人道法的规制。国际人道法责成各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以及民用物体。它明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对平民和医院进行攻击。它要求

各方确保对在押人员给予人道和有尊严的对待；要求他们搜寻、集合并撤离伤者病者；妥善处理死者遗体；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澄清失踪人员下落，等等。

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是改善武装冲突受害者处境的第一步。特别需要在以下十个领域采取紧急行动。这些建议旨在通过减少中东地区城市战争导致的苦难，并解决民众的迫切需求，来限制这些战争的影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敦促：

1. **交战各方时刻尊重国际人道法。**绝不能用敌方行动作为自身违法行为的托辞。
2. **支持武装冲突各方的各国政府确保他们支持的各方尊重国际人道法。**他们更有优势做到这一点。
3. **交战各方停止对平民的围困，确保有需求的城市社区能获得迅速、持续和畅通无阻的人道援助，并确保想要离开这些地区的民众可以安全撤离。**这些围困行为导致的艰辛正在给民众生活造成影响，并且会影响几代人。
4. **交战各方要避免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具有大面积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这些武器不仅会在其直接冲击地区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各种服务造成长期影响，对民众的健康和生存极其危险。
5. **交战各方尊重并保护复杂的城市生命保障系统。**这个复杂且相互关联的体系为民众提供水、电和公共卫生服务，对于城市卫生来说必不可少，它常常在城市战争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保这些体系从不遭到攻击或破坏。



2015年4月，也门萨那。在对该地战争所导致的损毁进行评估的过程中，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听取一位居民描述他的处境。

6. 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要尽量避免民众流离失所，要尊重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权利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7. 各当局和国际社会要为这些冲突难民提供保护与援助。
8. 各当局、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要开展更多工作来确保基本服务提供方和人道工作者受到保护。
9. 各当局、人道工作者和国际社会要加大投入，确保冲突受害者能获得适当的社会心理和心理健康支持服务。
10. 各当局、人道工作者和国际社会要帮助重建社区，而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城市是由人构成的，而不仅仅是建筑物。城市重建的方式将对民众最终是否能恢复正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我的儿子窒息而死”

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的故事：遭到攻击和围困

阿勒颇曾是叙利亚最大的城市，拥有210万人口，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人类连续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

现年50多岁的亚西尔曾是一名教练，同时也是布斯坦卡斯尔一带的街头商贩。对于像他这样的居民来说，阿勒颇曾是一个生活的理想之地，一个安全的城市，他的生意在这里发展兴旺，他和妻子可以在这里安心抚养他们的五个孩子。

但4年多的激烈冲突改变了一切。阿勒颇人口密集的街区变成了持续的常规轰炸区域，既有空袭又有地面火力攻击——所有这些攻击导致了大量的财产损毁和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最终，该市没有任何地方能免遭暴力局势的影响。

亚西尔所在的街区是数个几乎被完全损毁的街区之一。如今，绝大多数的公寓大楼、学校、企业和商店都变成了被炸毁的空壳，曾经繁华的街道变成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通道，蜿蜒穿插在散乱的废墟堆中。

对于亚西尔而言，战争的恐惧太过真实。在一个武装反对团体开始在他所在的街区开展军事行动后，他家所在的公寓楼被炸毁了。亚西尔说：“我儿子在那次袭击中窒息而死。大楼的一到三层倒塌了，他没能逃出来。”



S. Tarabishi/ICRC

2017年1月，阿勒颇贾代达。曾经热闹街道如今已经被战争损毁。

“大楼倒塌了，他没能逃出来。”



亚西尔的故事

自述

我从不想和战争各方有任何来往。我非常清楚如果武装人员进入一个地区会带来什么风险。如果我们居住的地方附近有军事部署，那么我们将被置于危险境地。但不管怎样，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我们的居民楼遭到炮火攻击时，灾难便降临了。我儿子在那次袭击中窒息而死。大楼的一到三层倒塌了，他没能逃出来。

我们进退两难，无路可逃。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经历我们所经历的那种艰辛。

在儿子死后，我妻子变得非常害怕。我们再也无法见到我们的一些孩子。我们的一个孩子在军队服役约有7年了，我把二儿子送去了德国读书，希望他今后能过得更好。我女儿在危机爆发前因为腿部肌腱受伤做过两次手术。在整个暴力局势过程中她都没能就医。

我的小儿儿子数学不太好，我们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小清真寺上课。当这个清真寺遭到猛烈炮击后，我儿子获得良好教育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当阿勒颇东部在上一个斋月（2016年）开始被围困时，由于民众在此之前已经被困了190天，局势因此变得更加困难。当时那里的局势处于瘫痪状态。由于没有食物和水，我儿子一直都是饿着的。食物非常贵，我们不得不吃各种豆类食品。我因此瘦了25公斤。

城市冲突升级？

亚西尔的故事在过去的4年中在阿勒颇各地上演过成千上万次。在2012年7月至2016年12月间，这座城市被划分为东（被武装反对团体控制）西（被政府军控制）两部分，在此期间，战争非常激烈，几乎日日开战，各方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了大量的重型爆炸性武器。

在冲突过程中，一些阿勒颇儿童的影像日益让全世界为之震惊：满是鲜血的面庞、视频中各种困惑、不知所措或受精神创伤的表情，或是当他们的尸体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挖出来时僵硬地躺在救援人员怀中。

随着暴力局势升级，人道和基本服务提供方想方设法地应对民众急剧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在人道工作者很难进入某些区域开展工作的情况下。他们向我们描述了当时前所未有的紧急局势。

人道遭到攻击

随着影响医疗救护和人道工作者的攻击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日趋频繁，阿勒颇战役成为了城市冲突中医务人员所面临的各种危险的典型代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道组织多次就不断恶化的人道局势发出警告。在阿勒颇和其他城市地区，诸如医院、水电供应网络和学校这类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不断遭到攻击。在2015和2016年，一系列针对医院和医疗机构的攻击导致医生和患者遇难，并导致数以千计的民众无法获得急需的医疗救护服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和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廖满娣医生在《卫报》的联合社论中表示：“我们所目睹的是对冲突期间的医疗救护工作的持续攻击和严重藐视。”⁹

对于人道工作者而言，叙利亚冲突是全球最危险的冲突之一。这场冲突夺走了63名叙利亚红新月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生命，¹⁰他们都是在执行任务时遇难的，很多是在像阿勒颇和霍姆斯这些城市中遇难的。很多其他的急救人员也在试图恢复基本服务或营救他人的过程中受伤或遇难。

这些针对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攻击引发了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促使联合国安理会于2016年5月3日正式通过了第2286号决议。它呼吁交战各方保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这些原则在国际人道法中已经明文规定。该决议强烈谴责那些针对伤者病者、医务人员和人道工作者的各种暴力与威胁行为。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些文字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政治意愿，以及各方真正意义上的参与。

人性之光尽显

过去五年里，阿勒颇的故事并非仅充斥着暴力与残酷行径。在暴力局势和每日的危险处境面前，叙利亚红新月会及其志愿者，连同普通民众和其他人道组织，在帮助民众度过愈加危难的局势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复原力、尊严和勇气，令人钦佩。

然而，从2016年4月到12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组虽竭尽全力，但仍无法将救济物资送进阿勒颇东部，只能远程提供支持，比如提供资金，以帮助解决用水、卫生物资、集体厨房燃气或工作人员薪水等问题。

2017年2月，阿勒颇卡拉塞区。废墟中的一辆救护车残骸。



撤离阿勒颇东部

2016年12月，经过数周激烈交战之后（前线推进到反对派的最后几个据点附近，导致许多平民受困其中），交战双方同意缔结协议，准许平民及战斗员从阿勒颇东部撤离。12月15日最终实现停火，自此至12月22日，有超过3.5万民众撤离到附近农村地区。撤离人员中有数百名伤病员。叙利亚红新月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组日夜坚守一线，对磨难中的民众不离不弃，在痛苦、混乱的局势中提供医疗和运输服务，并尽力提供建议和支持。

此次撤离行动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组自2016年4月以来第一次能够进入阿勒颇东部某些区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叙利亚代表处主任玛丽安娜·加塞尔在暴力

局势持续的最后几周和整个撤离过程中，都身处一线，她表示：“有许多汽车烧毁了。附近的建筑也冒着滚滚黑烟。恐惧和不安情绪蔓延着。我们到达时，看到的景象让人痛心。民众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们眼中充满悲伤。”

随着气温降到零下，在等待撤离的过程中，民众焚烧一切能找到的东西为自己和孩子们取暖，包括毛毯和衣物。加塞尔解释说：“几乎没有家庭决定留下。不过，大部分也都没有选择余地，因为家园已化作废墟，又面临着食物短缺，缺水缺电的状况，他们都认为在这个关头，撤离是最好的决定。加之他们长时间目睹这种暴力局势，没人能继续忍受这种苦难。”



2016年11月末，阿勒颇东部马萨坎哈纳努区。民众若决定返回该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叙利亚红新月会将会对该地的生存条件进行评估。

重返家园

即便已有人谈及“冲突结束后的阿勒颇”，但战争仍然在附近的乡村地区持续着。在讨论恢复城市秩序之前，必须先解决城市中极为重要且迫切的人道需求。据估计，城市暴力结束后，已有14万民众回到家中。但仍有数千人因房屋毁损较为严重等原因而无法回家。此前，其他暴力局势有所缓解的城市都是如此，如霍姆斯。至关重要的是，所有的流离失所的平民——不管来自阿勒颇还是其他地方——如果他们选择回家，就应获得允许和帮助，从而能够安全返回故土和家园。¹¹见第46页，混合影响：城市地区的流离失所者。

尽管阿勒颇有几年处于分裂状态，但该地区一直是相互依存的，只要可能，人们就会在地区间进行走动。家庭有亲戚住在不同的地区，且许多人在暴力局势最为紧张时逃到邻近地区或者完全离开了阿勒颇。阿勒颇民众的创伤感和丧失感是集体性的，城市遭毁坏程度极其巨大，未爆炸弹药和其他战争遗留物仍带来巨大危险。

“我不能离开我的城市。因为在这里，我还有尊严。”



“阿勒颇曾是天堂，我们什么都不缺。然而，转瞬间，我们就变得一无所有。我未曾想过要离开这里。但我也责怪离开的人，因为他们也别无选择。阿勒颇曾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但突然间，它由一个和平之地沦为极度危险之地。可以说至少40%的人离开了这个地区。”

穆罕默德今年48岁，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以制作家具为生。他所工作的小店位于阿勒颇的马什尔卡附近地区，该地区在整个敌对行动过程中，始终处于政府和阿勒颇东部反对派武装的交火线上。

“追忆一座曾生机勃勃的城市”

一座古城，遭遇一场被遗忘的冲突

从也门西南部的红海到多山的古城塔伊兹，只需一小时车程。塔伊兹曾是也门的工业基地、咖啡生产中心以及文化之都。

如今，该市部分地区沦为废墟，许多地标性的棕白砖建筑也未能幸免。街道尽是烧毁的汽车和各种残骸。

该市50多万民众¹²深受其害，他们经历了炮轰、狙击手射击、巷战以及空袭。虽然据说有几十万人逃离了该城，¹³但在该市遭到完全围攻的15个月中，仍有大约20万人没有离开。见第40页，混合影响：遭围困的城市。

交战双方僵持不下，就意味着前线在数月间变化不大，导致民众陷入一个旷日持久的、痛苦的僵局之中。

尽管围困的状况已部分解除，但目前该城的人道状况仍惨不忍睹：食物匮乏，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几乎崩溃。一度生机勃勃的城市街道已沦为充满恐惧之地。请见本章之后关于哈南的故事。

2016年11月，塔伊兹。在被围困的地区，妇女和儿童从水罐车上打水。





医疗卫生遭受灾难性影响

与其他交战中的城市一样，战争对医疗具有灾难性的影响。2016年11月，塔伊兹的几家主要医院报告在连续三天内，日均收治的受伤患者就有200名，其中许多人在爆炸中受伤，被迫进行截肢。

塔伊兹公共医疗系统几乎完全瘫痪，而紧急医疗服务需求却仍在不断增加。公共医疗中心全部关闭，该市仅有的两所医院虽未关闭，但也面临着资源有限、医务人员骤减等问题。留下的医务人员由于接近前线，需要长时间工作，还会频繁遭遇停电和炮弹袭击。

鉴于医院必须优先为重伤患者进行治疗，因而极少有时间或资源来应对诸如母婴保健、慢性或呼吸道疾病、常规疫苗接种或传染病疫情监控等公共卫生问题。武装团体建立的战地医院也同样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救治伤者上。

一般的救护车服务几乎不存在，战斗还会经常削弱医疗和人道工作者救护伤者的能力。执行任何一项一线急救任务都需通过电话，并与城中的检查站进行多次协商沟通。这样的沟通耗时较长，期间就可能发生伤亡。

而整个国家医疗状况的每况愈下，也致使局面更为恶化：2015年以来有超过160个医疗机构遭到袭击；¹⁴另有数百个机构因燃料和物资不足而被迫停业；目前只有45%的机构还在运作。¹⁵进入也门的基本药品和医疗物资匮乏（无法达到所需物资的30%），无法向医务人员和基本服务提供方按时发放工资，令情况雪上加霜。

2016年12月。一位老人走在因冲突而满目苍夷的居民区里。





“那一天，我的生活戛然而止”

——丧偶的塔伊兹居民哈南抱着她年幼的女儿。

一位遗孀的故事

自述

我的丈夫不会打仗。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携带枪支。他自己开了一家牙医诊所，我是他的秘书。当时我们的女儿刚出生。我们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直到城里爆发了战争。之后，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尽管城里冲突激烈，炮弹袭击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我们并不想离开一直生活的地方，所以决定留在家里。我丈夫的诊所也在家里。

我们这一地区满目苍夷，充满血腥、恐惧和孤独感，因此所有邻居都撤离了。

发生冲突时，我会紧紧地抱着我的女儿，带她去另外一个房间，尽量不让外面的声音吓到她。

那段日子极其煎熬，有一天我丈夫出门买日用品。但在回来的路上，他遭到附近房顶上狙击手的射杀。

那一天，我的生活戛然而止。我丈夫不在了，自己没了工作和房子。我付不起房租，只好回到父母家。我父亲收入微薄，但还要养活七个兄弟姐妹和我们母女二人。除了记忆中曾一度生机勃勃的城市，这辈子我已生无可恋了。

我希望战争能够结束，能看到孩子们回到学校。我想看到他们像以前那样玩耍嬉戏。希望我的女儿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没有战争和杀戮。



2017年3月，摩苏尔。孩子们在街道上玩耍。该城因近期的袭击而遭受重创，许多房屋及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或损坏。

伊拉克摩苏尔

“无论你往哪儿看， 都有人想杀你”

激烈的巷战是摩苏尔战役的特点，所以起初该战役似乎避免了伊拉克其他城市战中出现的大规模破坏。然而，随着死伤人数的持续增加，平民也在付出日益难以承受的代价。

战役打到尤素福家门口时，他正吃着早餐。“我正喝着茶，突然就发生了爆炸，”他说道。“弹片击中了我的双臂和双腿。我站起来跑到车里，之后就被送到医院了。我的双腿、头部和双臂都受伤了。我的家人也都在那次袭击中受伤。”

尤素福能活下来，是幸运的。然而，随着摩苏尔战役愈演愈烈，有更多的人也经历了这种可怕的遭遇，这给该城150万居民带来严峻挑战。

军事行动日夜无休无止；前线不断快速变换；担心亲人的安危；出门获取

医疗、用水或食物等维系生命的服务还要面临可能或真实存在的危险，这些只是战斗给平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中一些主要的方面。

由美国公共电视网与《卫报》联合出品的纪录片《摩苏尔战役》的导演乔舒亚·贝克表示，在摩苏尔东部的战斗中，战斗员与平民之间几乎没有距离。

贝克曾跟随过伊拉克摩苏尔特种作战部队，后在一次袭击中受伤。贝克说：

“一位指挥官告诉我，有时战斗会变得异常白热化，他会在厨房与客厅里的敌人交火，而楼上还有平民住户。”

贝克感到，他目睹到的极端暴力状况对受创伤的民众来说已经成为常态了。他讲起了他所在车队遭遇伏击的故事：

“我们把车（防弹悍马）倒到200米以外的另一条街上，设法摆脱了伏击。我们坐在那儿，还能看到战斗员就在拐角处。我们附近还有孩子在玩耍。我跳下悍马，试图寻找掩护时，另一条街就发生了自杀式爆炸袭击。就在紧挨着那个区域的地方还有其他孩子在玩耍，他们的父母就在附近。你很清楚他们明白周遭发生了什么，但暴力局势似乎多少已成为常态。”

此外，尽管民众的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但受害者遗体处理不当也导致不安感和绝望感加剧。受害者遗体往往被留在外面或压在碎石下。许多尸体就留在公共区域，包括水源附近，这加剧了对民众的感情冲击和他们的恐惧感。¹⁶

“因为炮弹袭击我们才离开。如果我们当时留下来，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2017年2月，塔姆宁居民区。城市冲突中，民众的家园常常沦为战场。哈立德与妻子（见照片）坐在家严重受损的房间中。





2017年3月。从摩苏尔西部流离失所的家庭。

今天，摩苏尔东部仍然在保证提供用水、电力、医疗、垃圾回收等关键服务方面面临着挑战。市场正重新恢复运营，餐馆也在重新开业，只不过许多人买不起市场上供应的食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埃尔比勒的一线协调员达尼·梅里表示：“有太多关键服务缺失了。由于服务和食物仍然短缺，有些

人又重新开始迁移，去往营地或者其他地区。并且，人道组织仍然很难正常、安全地进入该市的许多地区。”

许多房子、公共建筑、医院和被摧毁的地区或街道需要维修或重建。同时，安全状况依旧脆弱，因为像市场这样的公共场所仍是袭击的目标。

留下还是离开：生死攸关的选择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和危险，摩苏尔战役也反映了在防止流离失所及防止大量生命财产损失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进展。摩苏尔之战是逾14年来伊拉克境内包括巴格达战役、费卢杰战役、拉马迪战役在内的主要城市战斗中最近期的一场。

最近的拉马迪战役中，伊拉克军方经过4个月的激烈战斗，将拉马迪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这场战争极具毁灭性。在作战期间，大部分拉马迪居民先后逃离了这座城市。但由于该市遭到损毁的部分

高达80%，¹⁷且爆炸物满布，原拉马迪居民几乎无乡可返。2017年3月中旬，距战斗结束已经一年有余，当时因战争逃离的人里只有约60%重返了拉马迪。¹⁸

在全国范围内，即使在2016年10月中旬伊拉克对摩苏尔开始发起攻击之前，约一成伊拉克民众已经被迫搬离家园，¹⁹约三分之一需要某种形式的紧急人道援助。仿佛是为了避免另一次可能是灾难性的大规模迁移，伊拉克军方在摩苏尔分发传单鼓励平民留驻坚守。

对平民来说，留下或是离开，是一个复杂的决定，从许多角度来看是不可能作出的决定，因为无论哪种选择都会承担一些风险：是逃离但面临可能途中遇害的危险，还是留下但面对身陷交火之中的可能？无论如何选择，都没有万全之策能保证满足他们和家人的需求。见第46页，混合影响：城市地区的流离失所者。

摩苏尔的情况是，在东部3个月激烈的巷战之后，截至2017年1月，不到六分之一的居民逃离了摩苏尔或邻近村庄。²⁰这个数字远远低于预期。

“一些暴力局势似乎已成为常态。”

2017年3月。一名小男孩从伊拉克士兵旁边经过，他找到了一种新奇的办法用自己的自行车往家里搬运汽油。



交战激烈，战线模糊

虽然摩苏尔西部从地理上来说面积更小，但其街道狭窄拥挤，且人口更为密集，致使战线更加模糊，50万留守民众面临着更大的危险。至3月底，攻取摩苏尔西部的战斗开始不到一个半月，平民伤亡人数及流离失所比率就急剧增加。到4月初，从摩苏尔及周边地区逃离的逾30万居民仍处于流离失所之中，²¹其中约27.4万来自市区。²²然而，几乎没有安全路线可供居民逃难。虽然仍无法确认死亡人数，但各医院的伤员人数已经开始增加。摩苏尔西部的战斗还在继续，人道界仍在努力寻求安全无阻地进入该地区，以便提供食物、用水、医疗和其他基本重要服务。

摩苏尔的情况展现出了在城市战争中保护平民和基础设施的新趋势及新挑战。虽然主要战斗还是由战斗员在伊拉克联合空中支援和空袭行动的配合下，在市内进行的陆战，但新技术也开始崭露头角，例如榴弹发射无人机。

摩苏尔战役中，许多战斗员承认战斗的长期目标是确保伊拉克的稳定。贝克说道：“但就像一名指挥官告诉我的，短期目标是完成任务、赢得下一场战斗。长期目标显然更加重要，但如果在短期目标上出了差池，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2017年2月，摩苏尔。在住处附近发生的交火结束后，一家人正在搬离自己的家园。

“袭击来自四面八方，
包括轰炸机、卡车炸
弹、无人机投射的榴
弹、狙击手……无论
你往哪儿看，总有什
么想杀你。”

——美国公共电视网与《卫报》
联合出品的纪录片《摩苏尔战役》
的导演乔舒亚·贝克



“尽管人们自身处境艰难，
但他们还是收留了我们。”

——穆罕默德与兄弟易卜拉欣站在
他被毁的家园前。

A. Liohn/ICRC

重返废墟

自述

炸弹、迫击炮和子弹从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邻居们都逃走了。太可怕了。妇女、儿童和残疾人都必须经历这些危险，才能到达一个更加安全的地区。

尽管人们自身处境艰难，但他们还是收留了我们。我们本以为两天内就能回去，所以我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几乎什么也没拿。结果我们待了45天。然后我们返回了家园。

我们发现我们的车只剩了一个金属架子，我们的房子已经彻底被毁，无法修复了。四名战斗员在我们家里引爆身亡。我们将其中两具尸体拖到了街上。

车被烧毁可能还可以补救，但房子被毁的损失就全然无法弥补。那是一个你称作“家”的地方，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家更加珍贵的了。

今天，摩苏尔并不安全。损毁随处可见。而不得不应付清理这个烂摊子的，是那些居民。



穆罕默德讲述了他的故事，当时交火变得过于猛烈，他和他兄弟易卜拉欣两家人逃离了他们在摩苏尔东部的居住地区，预计几天内就会返回。一个半月之后，他们回来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摧毁，所在地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2017年2月，摩苏尔东部。遭损毁的居民区。

在陷入战争的城市中生活是什么样的？

没有哪一个故事可以充分描绘出城市战争的种种恐怖。一个陷入战争的城市就像更广泛冲突的一个缩影，但也有以下不同：由于城市人口密度大，具有多样性，且居民依赖于该城市既复杂又时常脆弱的基础设施，城市战争的后果往往会变得更加复杂。位于冲突前线的城市中的民众，常常必须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这些苦难相互联系，又相互加剧。

被**围困**或者处于相当于被围困的局势中的民众，甚至无法获得维持正常生活最基本的元素：食物、电力、用水和医疗。

其他人不得不背井离乡，从一个社区或者城市搬到下一个——有时重复着这一过程，或是逃往农村。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流离失所**，还同时必须应付这样的情况：他们逃往的许多地方是不安全的，也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一个原因是，城市冲突往往会摧毁或破坏那些维持城市生活的**复杂的服务系统**——电力、供水、卫生、垃圾回收、医疗服务等。这种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具有大面积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这不仅会导致民众丧生、摧毁建筑物，还会对维持城市生活与医疗的系统造成严重和长期的影响。

但是城市并不是只有建筑物、街道和基础设施。不绝于耳的爆炸声、外出的恐惧、亲朋好友的遇难：这一切所造成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影响**，必须得到处理。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介绍正在努力应对这些问题的人们，并阐述这些问题对个人和城市居民整体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1

遭围困的城市

2

城市地区的流离失所者

3

复杂的城市系统

4

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使用化学武器以及武器污染



2015年5月，也门萨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最近发生在塞万区的交战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在地下生活”

与世隔绝，挣扎求生



今天中东的城市战争有一个特点，即围困战这种古老的城市战争作战手段的使用越发频繁。²³2016年阿勒颇东部遭遇了广为人知的围困，长达190天；其间，人道援助工作受阻，致使许多其他中东城镇（例如费卢杰、塔伊兹、代尔祖尔、富阿、基夫拉亚、迈达亚）的平民也罹受了巨大的苦难。

2012年5月至2014年5月，叙利亚古城霍姆斯遭到围困。车贩阿布·哈尼说，因为没有柴油或汽油，而且白天也由于交火不能随意走动，他的家人要晚上上街拾柴火。

他补充道，由于食物短缺，人们尝试着自己种些蔬菜，但是他们往往不得不吃一些部分腐烂的兵豆和长在街上的植物，这些植物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可食用的。

“（在这期间）我们体重减轻了许多，”哈尼说道，“人们担惊受怕，无心考虑食物。一天一顿就够了。”

有些情况下，因为货物进出极其困难，陷入冲突的城市相当于被围困。塔伊兹自2015年夏季起遭受部分围困，当地经济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城市里的大部分市场都关门了，在一些仍然出售食品的市场上，食品价格往往昂贵到人们根本什么也买不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塔伊兹办事处负责人南希·哈马德说道，“营养不良的病例急剧增多，尤其是儿童病患。”

“因为没有食物，人们只能从垃圾堆里找吃的，”她补充道，“我们曾见过妇女们用树叶给孩子煮热汤喝。”

在受围困的城市内及其附近的交火还会破坏城里和城郊农田的收成，或者使人无法接近这些农田。在一个收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营地中，孩子们刚离开一座遭围困的城市，他们回忆起了饥饿的痛苦。一个孩子说道：“我已经不记得我上次看见一只鸡或一头羊是什么时候了。”

“直到现在，我的女儿们还会在晚上害怕地醒来。她们要妈妈。她们想念她。我们都很想她。”



2017年1月，霍姆斯老城。阿布·哈尼和三个女儿在离家历经两年半的流离失所之后，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修缮了自己的房子，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家中。阿布·哈尼在霍姆斯的房子曾被两枚火箭炮击中，他的妻子和儿子因此丧生，他和三个女儿得以幸存。

在另一个遭围困的城市里，人们每天靠非常简陋的一顿饭维持生存：一般是水和小麦或者大麦做成的汤汁。如果条件允许，人们可能会吃些米饭或者小麦片。一些妇女告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去探访的代表说，她们年龄小一点的孩子都不知道水果是什么样子。

人道组织要向居住在遭围困城市里的人们提供食物和其他救生物资（如医药用品）是极度困难的。这就是人道组织不断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获准进入遭围困的城市的原因。

国际人道法不禁止仅仅以敌方军事设施为目标的围困行为，但禁止一些通常与围困行为相联系的某些做法或作战手段，比如故意使平民居民陷于饥饿。此外，国际人道法还要求交战各方确保伤者病者获得他们所需的医疗服务。不论是围困方还是被围困方，都要始终注意在开展军事行动时不伤害平民。

绝望处境中的权宜之计

在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中，一群儿童最近刚刚逃离叙利亚的一座被围困城市，他们终于可以玩耍了。“我在这儿真高兴，”一个孩子说，“我终于可以跑来跑去了。以前，我们住在地下，因为有炮火我们几乎不能到外面去。我们只有石头块儿可以玩。”

因为长期在支离破碎的城市中生活，遭围困的民众显示出了极强的复原力，他们学会了在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条件下生活。清洁用品在当地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人们就用灰来洗衣服。一些人通过临

时简易方法从塑料中提炼燃料。他们把小片的塑料放入圆筒中大约煮9个小时，就能产出一一种叫talqa的液体，可以用于发电机、摩托车、水泵和其他机器。

饮用水也是一种珍贵的稀缺物资。可用的井眼里的水是用来浇灌农作物的，所以这些井水要煮沸后才能饮用。但一些人直接从这些钻井中取水饮用，就可能会面临患上介水传染病的风险。还有拖拉机将这些井水运送到一些社区去，但因为缺乏燃料，为水泵供电的发电机每天只能运转1至3个小时。

围困下的医疗状况

对一些医院来说，缺乏洁净水和必要的营养供给意味着它们除了要接诊遭枪击和爆炸的常规伤员以外，还要救治更多的肠道感染患者。许多医院还遭到火力袭击，或面临基本医疗设备和医疗用品的严重短缺，包括麻醉剂、抗生素和静脉注射液。此外，在医院缺乏收入或可靠资金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医院基本用品往往十分昂贵。

医院工作人员一般用发电机来应对经常性停电，因此汽油短缺使得他们无法提供某些关键的医疗服务。当地经济崩溃，加上缺乏政府资助，导致医院没有给员工

发放薪酬的资金来源；医生、护士及后勤人员往往在自己连勉强养家糊口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医疗机构运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正如社会各行各业一样，围困下的医院也严重人手不足。

许多情况下，人道组织提供设备、医疗用品及其他支持，包括提供发放员工薪酬的资金。但由于受围困地区存在准入限制，这种援助往往不稳定、不充足，在某些情况下无法维系。

此外，城市地区以外几乎无处可逃，因为只有城市拥有足够资源来供养数目庞大的人群。



2016年7月，塔伊兹萨比尔山，塔卢克。自2015年7月在塔伊兹施行的货物禁运限令既限制货物进入，也限制城内的货物流通。这就使得许多人被迫踏上可能会身临险境的艰难旅程，穿越陡峭的山路，以获得食物和其他生活基本所需。



逃离与回归陷入战争的城市： 一些令人恐惧的经历

自述

阿马尔和拉妮姆的故事

阿马尔和拉妮姆亲身经历了城市战争的恐怖。他们讲述道，2012年，他们带着还是婴儿的女儿最先逃离了饱经战火摧残的叙利亚霍姆斯，此后辗转至附近的两座城市生活，最后又返回了霍姆斯。阿马尔还回忆起全家首次回到他们在霍姆斯的老房子时的场景。他们的故事与约600万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境遇并无太大出入。见第46页，流离失所者一节。

阿马尔：我们抵达霍姆斯老钟广场邻近的一个地区后，那里爆发了激烈交火。一个反对团体从一边开火，军队士兵从我们停车点附近的一座建筑中进行反击。当时，我站在车前，我的妻女在汽车后座上。弹壳就打在车窗玻璃上。

拉妮姆：最终，历经一些惊险后，我们安全回家了。

阿马尔：当时，我们家附近设置了一些检查站，供电和供水都中断了。所有生活基本便利设施都在逐渐消失。

然而，离开陷入冲突中的城市绝非易事，也并不安全。阿马尔和拉妮姆回忆起他们逃往附近城市塔尔图斯时的可怕经历。



2017年1月，叙利亚霍姆斯。阿马尔来到他曾经居住的街区。

阿马尔：我们抵达了第一个检查站，那里有许多士兵。一个军官走上前来问我，我们来这儿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要去塔尔图斯。他给我们放行了，但是叫我们尽快驶离。我们照他说的开走了，但是一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检查站。那儿的士兵立刻拿枪指着我们。我朝窗外挥手，我的妻子害怕极了。

一名怒气冲冲的军官来到我们的车前，问道：“你是谁？”

我说，我和我的家人要去塔尔图斯。他回答道，如果不是看到有婴儿，他早就命令士兵向我们的车开枪了。他说：“是她救了你们。”然后，他就让我们继续上路了。

最终，为了能让拉妮姆重拾她教书的旧职，他们去了霍姆斯的另一个地区生活。他们倚赖慈善机构为孩子购置尿布、衣服和牛奶。

阿马尔：两年后，围困解除了。我是第一批重返那一地区的人。我一回去就直接去找我的房子。我们门前的街道被路障阻断，我不得不先进入别的房子，从那里再跳进另一所房子，就这样一所一所房子翻越，直到最终进入我们自己的房子。我无法表达我的情感；我当时惊呆了。家具全都损坏了，一堵墙也被毁了……我搜寻了一会儿，找到了我们最宝贵的财产——对我们极具情感价值的、满载着回忆的那些东西。

拉妮姆：我喊阿马尔。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哭。

阿马尔：是的，我哭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些？

“如果我们当时留下来， 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逃往、逃离或滞留在陷入战争的城市：城市流离失所者所面临的挑战

武装冲突期间，种种原因迫使人们为了自保和保护家人，背井离乡逃离家园。逃离可能是他们唯一得以保命的办法。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被迫流离失所，这通常是被视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他们可能匆忙离开，也可能精心策划，只背着几样最重要的物品或者只有衣物。无论他们以怎样的方式逃离，流离失所对相关个人和家庭都有着长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波及收容他们的社区以及他们的国家整体，尤其是在民众长期流离失所的情况下。

由于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仍在持续当中的战事，约1750万人²⁴已经逃离家园。其中大多数人（约有1190万）都留在了本国境内。这些人被称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是最弱势的平民群体之一。他们通常处在遭受攻击的危险之中，并且有时可能无法到达完全安全的地区；此外，他们可能一再地流离失所，因为他们需要逃离此前他们逃往的地区。

“我们一度享有美好舒适的生活。我们有一座房子，我的工作有稳定的月薪。暴力冲突爆发时，我像其他人一样失业了。我们失去了一切。

现在我不得不借钱给孩子买牛奶喝。这里没有学校，我负担不起让他们去上学的交通费。我儿子有皮肤病，但我没有车送他去诊所接受治疗。”

——一名伊拉克的10个孩子的父亲，2014年从辛贾尔镇逃离，从此居无定所。



I. Sherkhani/CRC



S. Tarabishi/CRC

2017年1月。由于摩苏尔的交火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在一个收容了25万人的营地中排队等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伊拉克红新月会分发食物。

2016年7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叙利亚代表处主任玛丽安娜·加塞尔与两名从家乡阿勒颇流离失所的年幼儿童在一起。当战火波及这一地区时，他们的家人以及在这个避难所里的许多其他人都被迫再次转移。

流离失所者可能会为了寻求安全、食物、庇护、医疗或工作逃往其他城市，但因为其他城市由于附近发生交火，资源已经较为紧张或者严重缩减，他们并不一定能得到上述资源。阿勒颇见证了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城市战役，但它从附近地区吸引了数千名叙利亚人。尽管存在暴力局势，但阿勒颇的部分地区看起来还是相对安全的，并且可能因为该市邻近民众原来的居所，所以有一些吸引力。但是，随着前线的迁移，一些之前安全的地区受到波及，许多人因而不得不再次逃离。

上述种种体现了民众正在经受的苦难的程度。“在一些我到过的地区，毁坏是巨大而彻底的，”近三年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叙利亚医疗协调员的埃夫丽尔·帕特森说

道，“站在远处看到的是完全被损毁或完全无法居住的建筑，然后你走进去之后发现，在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战地医院。”

现代城市战争破坏力巨大，作战方法残酷，因此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和社区。在一些情况下，挽救生命的基本服务完全缺位迫使整个社区迅速搬离，以获得紧急医疗救助。以摩苏尔为例。“在摩苏尔许多伤员难以获得医疗救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伊拉克传播代表萨拉·扎乌卡里说道，“我听说一名13岁的少年在试图逃离时中枪。他历经三四个小时都无法撤离。一名男子告诉我，他的妻子临盆，他花了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才离开那个城市，找到一所战地医院让她生产。”

流离失所却销声匿迹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逃离家园，逃往城市地区的人往往比逃往农村地区或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人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在城市中他们往往更加不起眼。比如，在叙利亚的一些城市中，废弃的或者尚未竣工的建筑被改造成了集体避难所。一些家庭在这些建筑里搭起了临时避难所；还有许多其他人去投奔亲戚。

2016年8月阿勒颇西部的人口大规模迁移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成千民众逃离家园，迁往他们能找到的安身之所，包括公园、清真寺、学校和未竣工的建筑。许多未竣工的建筑没有墙，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原本设计为豪华住宅的建筑变成了非正式的集体避难所，没有下水系统，没有供水基础设施，也没有道路。人道组织不得不采取些临时应对措施：例如，为保护人们免受暑热或寒凉安装隔热层，提供隔板保护隐私，还设计了短期供水方案。

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往往十分复杂，并不仅仅限于物质援助。比如，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突然而又匆忙地离开时，家人骨肉分离的情况时常发生，并且人们往往遗失或忘记携带使用基本服务（如医疗、教育）所需的官方文件。

人们迁移时往往没有在当地或人道组织留下记录，因此，要了解流离失所者的去向、需求以及如何有效应对就往往比较困难——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例如老人、残疾人和与父母分离的儿童）需求的有效应对。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流离失所者比较分散，识别出他们以及与他们取得联系都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一些城市已经建立起帮助记录流离失所者行踪的系统，但往往都难以持续跟进。因此，这些城市中流离失所者估计总人数很可能非常保守，有关他们需求的信息也并不完整，这就使得展开充分有效的应对行动更具有挑战性。

2016年11月。一家人通过未铺设路面的泥泞山路离开塔伊兹遭围困的地区。



重返家园

对于期望重返家园的人来说，家乡的安全状况并非他们唯一的顾虑；遗失官方文件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尤其是因为政府可能会在重新融入方面设置繁琐的手续。财物损毁是另一个大问题，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没有财力物力去重建自己的家园。

帕特森指出：“人们通常都想尽早回家。他们担心别人会搬进自己的公寓，或者担心失去它。重返家园是他们恢复身份的一种方式。但这取决于他们的家园还剩下多少没有被损毁。”

在中东许多受冲突影响的城市中，可供众多流离失所者重返之处所剩无几。以伊拉克的拉马迪为例，据多方消息称，²⁵约2000座建筑和4.8万所民宅部分或全部损毁。此外，关键基础设施，比如桥梁、主要医院、火车站及为超过半数的拉马迪居民提供服务的水处理厂，也都被摧毁了。

2017年3月，摩苏尔。一位老人走进他的家中，这座房子在近期冲突中遭到破坏。老年人逃离家园时往往要经受极大的苦难。即使交火已十分猛烈，他们也经常会因为过于虚弱而无法离开。



逐渐损失

有些人顷刻之间失去所有，但流离失所造成的逐渐损失与之相比，毁灭性可能不相上下。旷日持久、一再反复地流离失所，往往会令那些（通常是在亲朋的帮助下）本来设法稳定住情况并恢复了部分资产的人失去这些资源。

以贾迈勒*一家为例。2015年，在贾迈勒的家乡，也门萨达农村地区的萨肯发生了猛烈空袭与交火，迫使他与妻子及8个孩子逃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一个郊区。贾迈勒现在50岁了，开战前他有一份农场工人的稳定工作。但自从逃离了家乡，他无法找到稳定工作，也陷入了债务。他的孩子中有两个患有癌症。

贾迈勒迫切地想要养家糊口，因为没有钱买食物，他们家经常无法保证一日三餐。

他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我卖掉了我妻子的首饰和我们所有的家什。我负担不起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的开销。我们住在一所房子里，但我已经没有钱付房租了。因为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的孩子们去年（2016年）根本没去上学。”



2015年8月，阿勒颇。一个孩子正在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修复的井眼处喝水。

复杂的城市系统

“我们的目标： 确保供水保持中立”

城市内部和周边的战争破坏了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服务网络

哈米德*是阿勒颇东南市郊水厂的一名技术工人，在为叙利亚冲突各方的人们维持供水服务的工作中，他遇到了许多挑战。

哈米德说：“冲突期间，我们必须在两个水站之间往返工作，每周都要在人道伙伴及一线各方的协作下穿越前线。”

一处水厂被不同武装团体轮流占领了一段时间，厂里的铜线也被掠走。哈米德说：“我们的目标是维持供水设施的运转，并保证供水的中立性。我们经历了一些可怕的瞬间；感觉就像恐怖电影片段。”在执行一次高危任务时——向被三个不同冲突方控制的区域提供服务——冲突爆发了，哈米德中枪，被送进了医院。

*文中使用的是化名

即使在战时，供水也不能中断

袭击对平民居民维持生存不可或缺的物体，以及对这些物体的运转造成其它破坏——例如，供水中转站、电缆或地下排水管道因使用威力巨大的爆炸性武器而受损——在今天的城市战争状态下已变得屡见不鲜。

除了提醒所有交战方有义务尊重且无损及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与其合作的国家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与当地水务部门及服务提供方开展协作，加强既存供水、供电和公共卫生服务，以增加如今中东地区城市的这些服务抵抗旷日持久战争的能力。²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东和中东水与居住环境行动协调员迈克尔·塔勒哈米表示：

“为避免出现此类危机，我们要使这些服务能够应对和承受冲突所造成的冲击和压力，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尽快恢复运转。”

许多中东城市的水源和泵站通常设在市区之外或者散布在各地，重要供水管道跨越为对立武装战斗员所控制的区域。在扩增水源之前，需要进行详细的风险评估，以减少城市片区因前线转移或设备损坏而供水中断的风险。例如，在塔伊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当地水务部门合作，在城内外都进行了旧井修复和新井开凿，现在近90%的城市饮用水都由这些水井提供。

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随着今年交战开始升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当地水务部门协作，增加了全市的水井数量。这样，即使供水服务中断，当地民众还有备用水源。设备关键部件的规格可能通常较为特殊，都会提前订购，因为从收到货品，到对新部件进行改造以使其与原有系统相匹配，可能需要数月。对需要洁净用水和环境卫生服务的民众而言，这数月的时间会十分紧要。提前积极准备非常关键，因为一旦城市陷入交火，扩增供水将可能面临极大困难。



2016年12月，也门萨那。一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程师与当地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一个地区接通主要公共供水管道。

严峻的环境

不幸的是，在冲突爆发，恢复服务的人道工作开展之前，相关地区的供水几十年来已经在不断缩减。整个中东地区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基础设施老化及渗漏、干旱、含水层萎缩、地下水位走低、耕地沙漠化及盐碱化。²⁷

专家们表示，仅靠增加钻井数目，进行紧急性取水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阿勒颇水与居住环境工作组负责人毛里西奥·佩舍利称：“这些水井中水位逐渐下降，这已经显而易见，须高度警惕。”

因此，国际人道机构和组织在采取应对措施时，必须将一系列复杂因素纳入考量：基本城市服务的多元性及相互关联性；反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冲突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累积性影响的加剧；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如何抵达有需求的民众；对高度安保化的工作环境的政治考量；以及与需求的持续期间及规模不匹配的资助方案。²⁸

尽管任务复杂，破坏程度严重，还要面临危险与艰辛，阿勒颇水务部门工人哈米德*确信，他为持续供水所做出的努力会见成效。“历史上，这座城市曾适应艰难环境，挺过了不少危机和地震。阿勒颇会得以重建，再现繁荣。”

*文中使用的是化名

2016年5月，荷台达革命医院。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程师在检查一台发电机的马达。



S. N./ICRC



F. Al-Homaidi/ICRC

2016年8月，塔伊兹附近。当地居民在一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取水点取水。



S. N/ICRC

2015年1月，伊拉克麦地那西亚希耶城。人们给自己的水瓶装满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修复了市内因交战而损毁的水泵和过滤装置。

城市对国家及地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支撑了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但同时，城市也十分依赖外部资源。城市居民所消耗的大量食物，产自位于郊区或更远地区的农场。维持汽车、卡车、发电机和供暖系统运转所需的燃料，来源于离居住中心有一段距离的油井和冶炼厂。发电厂、供应线路、水处理厂及污水处理厂通常也都位于城外。

因此，即使在远处作战也可能对城市居民产生极大影响。交战发生在市区内时，敌对方的交战前线可能会跨越为全市提供服务的水电及排污管道，相互关联的庞大水电系统可能会处于不同武装派别的控制之下。因而在旷日持久的冲突期间，保障民众的生命与健康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

冲击波

在城市战争中使用具有大面积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的毁灭性后果

在今天中东地区的冲突中，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具有大面积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的情况屡见不鲜，对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产生了毁灭性后果。

由于毁伤半径大、发射系统缺乏精度，或发射多弹药进行大范围打击，使用爆炸性武器可能造成大范围影响。此类武器包括：大型炸弹及导弹（包括“智能”激光制导导弹）；间接瞄准导弹系统（例如非制导迫击炮、火箭炮及火炮、多管火箭炮）；以及特定类型的简易爆炸装置。这

些爆炸性武器不仅在爆炸时会造成致命危害，空中四散的弹药外壳碎片或二次破片也会致人死亡。²⁹

城市战争中，交战发生在社区，战斗员混杂于平民之中。即使瞄准军事目标，具有大面积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也可能在人口密集地区产生不分皂白的打击效果。由于合法军事目标混布于平民及民居、医院、学校之中，使用爆炸性武器会对平民居民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2016年12月，塔伊兹。在这座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中，一栋被部分损毁的民用建筑。

受影响地区之外

使用具有大面积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除了在直接影响区域内造成人员伤亡和破坏之外，还会对城市产生各种各样的长期影响。基本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或被毁导致基本服务中断，从而对平民造成包括伤亡在内的严重、深远的损害。

持续且猛烈的轰炸破坏力极强，是人们逃离自己居住的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城市社区几乎完全被毁，因此许多城市（例如霍姆斯、拉马迪、阿勒颇、塔伊兹）对于离乡者而言，即使在停火之后，也已无乡可返。

这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呼吁武装冲突各方避免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具有大面积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的部分原因。³⁰

化学武器

尽管化学武器被绝对禁止使用，但仍不断有相关指控频繁出现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断出现关于使用化学战剂以及将氯用作化学武器的指控，情况十分令人担忧。化学武器为国际人道法所绝对禁止，冲突各方必须避免使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组密切跟进相关事务，提醒冲突各方牢记这一绝对禁止的规定，履行其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义务。

有毒化学制剂或生物病原体不仅对直接感染者存在潜在危害甚或致命，还可能危及医务人员，污染救护车、手术室甚至整个医院，导致这些关键设施在需求最为迫切的关头恰恰无法发挥作用。这一担忧并非无中生有，最近在摩苏尔出现的显然使用了有毒化学剂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包括儿童在内的15名住院患者出现了糜烂性毒剂临床中毒症状。³¹

城市冲突日益频发，人道机构对其帮助城市应对激烈暴力局势及规避风险的方法也进行了再度审视与改进。在伊拉克和乌克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器污染部门所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识别可能储存有毒化学品或其他危险物质的工业场所及其他地点。对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附近的工业设施造成意外或蓄意轰炸，会带来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在为应对这种可能情况作准备时，地点信息可能十分关键。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器污染部门在伊拉克与医院及医疗中心展开合作，帮助这些机构提高其应对能力，以处理由于使用传统爆炸性武器或释放有毒化学制剂造成的大规模人员伤亡。该部门还向摩苏尔附近的两家医疗机构提供了培训和设备，以便其收治沾染了有毒化学品及战剂的患者。



2016年11月，伊拉克摩苏尔附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器污染专家对当地一家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主题是如何安全治疗曾暴露在化学制剂或生物制剂下的患者。

致命遗留物

即便战争已经结束，未爆炸武器仍会造成民众死亡

据估计，在冲突中使用的炸弹、火箭炮、炮弹及集束子弹药中，约10%到15%没有在撞击后爆炸，而是依然埋在地下或是废墟中，严重危及居住在城市涉冲突地区的居民。

这些未爆炸武器还对参与紧急救援工作的人员，或者从事恢复服务或疏通道路和修复建筑这些长期性工作的人员的安全造成威胁。

基于上述原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器污染部门在有条件的地区(如伊拉克)开展了定位、移除和销毁未爆炸武器的工作。该部门还与当地合作伙伴(包括国家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合作，向公众普及这类武器的危险。

对受未爆炸武器污染的城市社区进行长期性的重建，危险且费用高昂，因为工作人员必须小心谨慎，确保在使用瓦砾清扫设备之前，所有区域都是安全的。

2017年2月，伊拉克摩苏尔附近。一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器污染官员在供水站附近进行地面排查，检测未爆炸炸弹。





2015年7月，萨达。两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冲突所造成的破坏进行评估。

受战争遗留爆炸物重度污染的也门城市萨达也受到集束弹药的严重影响。这些武器的致命遗留物更广泛地分布在也门不同地区，萨达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遗留物已经远远超过了也门排雷执行中心做出应对，并进行安全清理的能力范围。近几个月来，几位排雷人员已在相关事故中丧生。使用武器的数目和（在很多情况下）技术复杂程度，都形成了长期、严峻的挑战，需要采取紧急的协同行动进行应对。



2016年7月，也门。一个小男孩坐在他家的废墟中。

M. Al Qanas/ICRC

情感、心理与社会心理影响

“我看着自己崩溃”

除了身体上的伤害，旷日持久的城市冲突还会造成非常真实而持久的心理创伤

创伤性事件所造成的情感、心理与社会心理上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某些情况下会持续一生。对陷于旷日持久的城市冲突的人来说，恐怖的暴力或残忍事件可能就是他们每天必须经受的事实，这种情况有时会持续数年。

对于许多像马哈茂德*和乌姆·阿里*这样的人来说，这种创伤过后，还要面对长期流离失所造成的持续动荡与不安全。也门塔伊兹在交战中被摧毁后，这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们在塔伊兹的家。

在萨那城安顿下来后，夫妻二人连孩子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营养、衣物和教育——都很难负担得起。丈夫马哈茂德说：“我心理上、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

了影响。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改变了。当我无法提供孩子需要的任何东西时，我感到十分沮丧。我觉得生不如死。”

乌姆·阿里也认为，战争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家庭的心理健康。“我的儿子们已经完全被毁了，”她说道，并补充说她的长子因为心理问题已经不再去上学了。

“我丈夫以前有工作，但因为战争失业了。现在他饱受精神问题的折磨，还对儿子施暴。”

当人们失去如此之多时，他们往往觉得自己的自我意识和幸福感都被剥夺了。27岁的萨米*现在居住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在那里他勉强能找到一丝正常感觉。“我只想勉强度日。目睹了这一



2016年11月，一个小女孩在德巴贾难民营。德巴贾难民营是为接纳由于伊拉克摩苏尔的交战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而设立的。

切之后，过上‘还可以’的生活已经很难了。我见证了我的城市灭亡，看着自己崩溃。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好好活着，但我希望如此。”

在最具考验性的情况下，平民和社区往往展现出惊人的复原力和适应性。但是，这在冲突持续期间尤为困难：不停地担心亲人的安危，不断为了食物和其他基本所需而焦虑，在显然会造成精神创伤的局势中，都会加剧个体所面临的困境。有些人的反应是愤怒或绝望，但有些人默默地对所处的环境逆来顺受。悲痛欲绝和心存恐惧都已变得司空见惯。

虽然大多数人能够应对他们所经历的不幸，继续生活，有些人则会遭受令其失去正常生活能力的心理创伤。几个因素使城市战争所造成的心理损害有其独特性。因为离交战很近，爆炸声不断，人口稠密地区的民众常常暴露在造成重大伤亡的恐怖事件之下。没有“安全”场所可供民众放松，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断，以及缺乏诸如医疗或教育这样的基本服务，都会加剧心理影响。

同时，由于潜在需求的规模较大，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以及收容因冲突逃离的民众的国家，当地医疗系统通常无能力识别有相关需求的民众或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支持。几乎在所有经受冲突的城市中，当地经济的崩溃或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也会影响心理健康服务。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这些服务通常都处于资源不足的状态，而冲突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专业人士也加入了被迫逃离交战者的行列之中。一些国家和非政府参与方开始参与进来，帮助弥补这一空缺。人道组织，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与其合作的国家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正在努力扩大他们所提供服务的规模。但是，在这一领域，仍需要更多的投入。

在危机的阴影中成长

儿童属于特别弱勢的群体，但很少有服务（例如心理辅导或心理治疗）帮助他们处理情绪问题；而且正常童年应有的所有因素，例如学校以及和朋友们玩耍，或是缺失，或是受到极大破坏。阿勒颇的一位父亲说：“我11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没有真正的童年。他们经受了可怕的经历。儿子哈穆德有时会惊恐发作。他一听见大的声响总是会跑开藏起来，即使是关门声大一些也会这样。”

缺乏教育，缺少工作机会，没有文娱活动（例如运动），即将成年的青年人的忧虑得不到处理：所有这些造成的心理压力可能会通过加入帮会、性暴力或其他暴力以及其他不法行为来得以释放。

屡次经受亲人去世或失踪之痛的人，往往要经历一种非常特别的折磨。贝鲁特居民玛吉·昂德丽奥蒂在黎巴嫩内战期间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由于火箭弹爆炸丧生，另一个死于本可治愈的疾病——由于他们附近发生交火，她没能将儿子及时送到医疗机构而导致了死亡。然而，无法得知她第三个儿子的下落，甚至比另两个儿子的死亡更令她痛苦。她的第三个儿子在1978年贝鲁特交战期间失踪，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失踪时年仅16岁。

她说：“如果孩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妈妈最初会难以入睡，但最终还是可以睡着。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死去了。但是如果孩子失踪了，妈妈就再也无法入睡了。我正在承受这样的经历，因为我还有一个孩子失踪了。”

2015年5月，也门萨那的一个居民区。一名男子和他的女儿站在被毁的家园前。



T. Glass/CRIC

日常生活的改善往往能提供感情上和
心理上的慰藉：例如，得到有关他们失踪
亲人下落的明确答案时，或者他们的一些
基本需要（避难所、食物、洁净用水或医
疗）得到满足时。

叙利亚老城霍姆斯的车贩阿布·哈尼，
本就终日焦虑，每天还要在遭围困的城市
中尽力寻找食物，然而他最深的恐惧发生
了：一枚火箭炮击中了他们家的房子，他
的妻子和最小的孩子因此丧生。

爆炸中哈尼的腿被炸断了，无法继续
工作。除了要承受那天的恐惧，以及失去
妻子和宝宝的悲痛，他现在一个人要照看
三个女儿。他说：“我没有工作，所以我
们只能依靠赈济。”

这一切都给阿布·哈尼造成了极大的心
理压力。然而，例如当他的女儿们终于能
回学校上学时，他感到了一丝希望。这种
解脱通常只有在交战结束以后，当家人能
重新感到安全，人们可以真正重建自己的
生活时才可能实现。

“直到现在，我的女儿们还会在晚上
害怕地醒来。她们要妈妈。她们想念她。
我们都很想她。然而，我很高兴能看到我
的女儿们一天天长大，去上学，她们正在
恢复正常的生活。有两个女儿参加了表演
课。几天前，她们参演了一出戏剧，对她
们来说，生活正在发展。”

★文中使用的是化名



“如果孩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妈
妈最初会难以入睡，但最终还
是可以睡着。我就有过这样的
经历，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死去
了。但是如果孩子失踪了，妈
妈就再也无法入睡了。我正在
承受这样的经历，因为我还有
一个孩子失踪了。”

——玛吉·昂德丽奥蒂手里拿着
她失踪的儿子的照片。

“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 但我会试着原谅。”

黎巴嫩内战主要是城市战争，这些发生在人口稠密且极其多样化的城市地区的冲突让当地民众付出了各种惨痛代价，给人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复兴城市社区，远不止重建建筑物。

“战争对社会的改造，不是促进发展和进步，而是国家要付出代价：城市被摧毁，社区分裂，经济一蹶不振，交战期间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要付出相应代价……在战争刚结束时要讨论的不是乐观主义，而是如何为这些损失买单。从过去的经历（如黎巴嫩）中汲取教训，对于应对叙利亚、伊拉克或也门的冲突非常重要。”

—— 采访前黎巴嫩政治领袖、撰写过多部阿拉伯文化、
政治及历史方面著作（包括《黎巴嫩现代史》在内）的
历史学家法瓦兹·特拉布勒西教授



建筑物甚至是社区都可以在冲突之后得以重建，但维持一座城市运转的社会结构、集体记忆及关系网，可能永远都不能完全修复，因为许多人都已经离开或者死去，各群体间的关系也已经改变。

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实际上以1989年达成的和平协议告终，其间许多人口密集地区（即在贝鲁特的地区）遭到了极大损毁。内战还使得黎巴嫩多元化的人口四分五裂，其影响至今仍在持续。在减少冲突后苦难以及帮助重建受战火摧残的城市社区方面，我们能从黎巴嫩的例子中学到些什么呢？

对战后的黎巴嫩进行研究的人员认为，要修复战争导致的断裂，必须要重建社区、恢复社会凝聚力；而且必须及时作出相关努力，即使新的或遗留的矛盾与怀疑以及战争产生的长期创伤性影响可能会令这些工作的效果有所减损。

专家表示，这些工作必须确保逃离民众感到，不论其政治信仰、社会阶级或宗教背景为何，都能安全返乡并受到欢迎。关键设施（例如教育机构）能够帮助培养社会凝聚力；当然，它们也可能固化分裂。民间社会及当地社区的参与也十分关键。前战斗员重返社会的问题必须尽早处理。

黎巴嫩的经验

由于持续时间长、强度大，黎巴嫩内战对其国民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黎巴嫩的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和工业基地³²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几十万受过教育、

训练有素的黎巴嫩人移居国外，造成了许多重要职业人才缺失、发展受限。³³

虽然流离失所者、伤者或亡者的统计数据有较大差异，³⁴但冲突所造成的巨大而



持久的人口、社会及心理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城乡都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但是贝鲁特是战争的主要舞台之一。社会的军事化，民兵组织和交战团体的扩散，以及这些组织团体邻近平民地区或社区的布局（尤其是在城市中），与我们今天在其他中东城市战争中所目睹的情况十分相似。

即使在今天，离交战结束已25年有余，各方的违法行为，死者和下落不明者，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包容性教育的衰退以及缺乏具体措施应对社会的深度分裂，仍在困扰黎巴嫩。

对“他者”的非人化以及根深蒂固的分裂

黎巴嫩的经验与现代冲突的一个相似之处——但这不仅限于城市战争——在于，冲突各方设法对敌方在思想、政治、种族和宗教方面进行非人化是如此容易。在城市中尤为明显，因为城市相比农村地区人口组成庞杂得多，社区也杂居，相互之间距离贴近。

特拉布勒西解释道：“黎巴嫩战争期间，交战方会使用教派或宗教相互攻击，不同社区开始被贴上‘巴勒斯坦人’、‘逊尼派教徒’、‘什叶派教徒’、‘德鲁兹派教徒’的标签。个人变成一个群体的代表，然后其所属群体被简化为个人。曾针对军事目标与人员的绑架及人质解救、暗杀和汽车炸弹袭击如今开始发生在平民身上……这些行为能够削弱敌方战斗员的士气，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军事利益。”

在整个黎巴嫩战争期间，人们的流离失所与部族暴力行为紧密相关，不同群体往往按照教派或宗教分界线划分势力范围，对地理区域加以控制。他们将地区划分，设立检查站，并征收入界费用：贝鲁特

市被划分为东部和西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些地理划分在战后时期继续存在。

今天，在其他地区，也存在相似的趋势。例如，在也门，由于出现了与黎巴嫩相似的流离失所状况，部落群体之间以及南北方群体之间的矛盾正日益深化。特拉布勒西说，在战前，一部分北方人曾居住在位于也门南部的亚丁。发生暴力事件时，他们被锁定为打击目标，以试图迫使他们离开。许多人回到了北部；其他人去国外。

也门的冲突已经破坏了多元族群共存的局面，不同族群之间的地域邻近也由此消失；各个城市由于其他人口流动而开始具有新的身份特征。许多也门城市居民去往乡村，在那里，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农耕、畜牧及其他途径保证食物来源。与日俱增的饥荒风险、货物流通的障碍以及城市遭受围困：所有这些状况的加剧都推动了居民逃离城市。反之，其他许多人由于暴力局势逃离村庄，在城市中寻求庇护。见第46页，流离失所者一节。



B. Hubschmid/CRC

黎巴嫩的经验生动地说明，战斗结束后，如果不对这种地理分化进行处理，重建将会变得困难得多。著名中东研究学者、作家伊丽莎白·皮卡尔³⁵解释道，签订和平协议之后，当政治领袖们接受了族群分隔复原的想法，这些所谓的封闭社区只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她表示：“黎巴嫩从未从这个过程中完全恢复过来。首要的是停止交战，并接受每一方在其小领土上进行重新整合。他们只是‘冻结’，而不是着手处理相关局势。”

与政治信仰及宗教身份相同的人共同生活的做法受到鼓励，而不是重新创立具有战前时期特征的杂居社区。皮卡尔博士补充道：“起初，有一些抵抗这种导向的尝试，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活动家，他们想要从内战中吸取教训，然后向前迈进。但是当地的和国际上的政客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机会之门不久后就关闭了。”

战争的创伤性经历加上缺乏政治动机，有助于揭示许多人战后不情愿返乡的原因。现任黎巴嫩红十字会秘书长的乔治·凯塔奈在战争期间曾是一名年轻的应急人员，他表示：“有几处地方人们永远不愿意回去。并不是时间或者代际的问题，而是他们已经决定在别处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政客们以及国际社会应该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有关处理和重建社会关系及信任的经验。这将有利于未来的和解行动从中获益；也会有助于确保民众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宗教信仰，得以依据自己的意愿重返故里。

“一座城市的重建不仅包括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重建，”皮卡尔说道。她还认为，帮助修复社会结构的明确意图能使城市得以重建：“城市规划对于重建一座城市的社会结构而言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在黎巴嫩，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并

未在战后启动。财产所有权通常反映的是富人的财务利益，重建的开展往往是为了在安全的前提下保持街区人口的构成单一，且社区分化。”

在其他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城市当中，这些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担忧：曾一度构成城市优势的多元化，可以迅速转化为断层线。例如，伊拉克摩苏尔曾以其族裔及宗教多元化著称，全伊拉克第二大的大学就坐落于此。

从2003年起，状况就发生了许多变化，许多构成这一丰富多彩图景的人们离开了。在国家普遍动荡的局势中，多个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更加复杂：不同地区的持续暴力事件以及采取敌对行动的方式，已经明显对社会凝聚力造成了损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线协调员达尼·梅里表示，许多城市隔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依族裔或宗教而划分界限。他说，目前在摩苏尔开展的军事行动以及交战结束后所做出的努力，对于确保将来的和平共处十分关键。

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冲突以及长期不确定的安全状况，已经催生出了众多武装派别，许多派别之间存在分歧，但为对抗共同敌人已结成联盟。这就引发了有关在这一更大规模的冲突结束之后，将会发生什么的严肃问题。

当地专家的参与

无论采取怎样的解决方案，听取已经在开展有关社区稳定工作的当地团体意见并与之进行合作都至关重要。通常，地方发起的举措与运动填补了缺乏有效运转的国家服务的空白。在城市中，这些当地团体最了解居民和社区的需求。

在黎巴嫩内战期间，民间团体成员走上贝鲁特街头倡导和平，并且要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在叙利亚，一个不明显但很重要的社会发展就是，出现了地方上的城市议会（当地称作tansiqiyat），在确保

城市服务及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社区提供帮助方面，扮演了更具战略性的民间角色。

城市议会响应十分积极迅速，并且在反对派控制区和政府控制区都设有机构，以协助组织当地援助以及推动重建工作。伊丽莎白·皮卡尔解释道：“这些极具开创精神的人士，以及其他基层组织，都绝对是这些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必须咨询他们的意见，并让他们参与到协助此后的城市重建工作当中来。仅靠自上而下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发展包容性机构：重建教育

近期的区域性战争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一方面，针对或不分皂白地对教育设施的袭击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及大量的人员伤亡，并耗尽了教育资源。岌岌可危的安全状况和暴力局势还带来了其他后果：无法保证正常出勤，师生流离失所，收入减少（致使这些家庭的孩子辍学）。

恢复教育机会，即使在冲突期间都十分重要，也常被各个社区视为与食物、安全及医疗同级的首要任务之一。黎巴嫩内战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大量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移居国外，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移居也没有停止。³⁶在伊拉克，类似的移居国外的现象已经存在数十年；叙利亚和也门最近也开始出现类似情况。

对教育的影响是叙利亚战争造成的重大损害之一。这是年轻的叙利亚人遭受严重打击的另一个方面，也是年轻人大规

模移居国外的原因之一。战前，政府提供教育系统运转99%的所需资金。伊丽莎白·皮卡尔表示：“今天，有一代儿童没有接受教育或接受的教育质量很低。对于叙利亚年轻一代以及叙利亚的未来而言，教育是极其重要和关键的大事，迫切需要引起关注。”

教育设施不仅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很重要，而且在凝聚社会不同部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黎巴嫩大学曾汇聚了具有不同宗教背景、来自不同教派和地区的学生。特拉布勒西教授表示：“但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大学变得分化，学校和大学开始私有化。分化由此加深，而非得以弥合。战后，教育系统应该在保证交流和沟通方面发挥作用。”这一点在传统上混杂和多元化的城市地区更为重要，要抛开分化，继续向前。

交战结束后，战斗员去往何处？当局还必须处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让参与交战的战斗员重新融入社会。例如，许多战斗员可能为了保卫自己的社区和家庭而加入了武装团体。其中一些人加入武装团体时可能还很年少，在暴力环境下长大成人。黎巴嫩内战后，大量战斗员加入了国家军队，只有少数人复原，重新融入社会。

“我为什么不参加战斗来保卫我自己和家人？”

自述

易卜拉欣*，曾参与黎巴嫩内战。

“当时我22岁，身体健康。我为什么不为了自己和家人而战呢？我们住在贝鲁特附近。突然之间，我们四面都是危险。每次走动都会觉得自己可能会在途中被杀。去买面包都感觉像是一项自杀性的任务。去上学？别提了。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停止了。只有死亡和苦难无所不在，触手可及。”

“他们告诉你，战争就是地狱。但之后，你目睹自己的同志死去，听说另一个朋友失踪。面对这些你怎么可能做好准备？你无法准备好。我觉得我当初应该避开一些地方的，如果避开了，我就不会看见那些事情。”

“我们不是恶魔，我们是人。敌方也是如此。”

战争爆发前，没人料想到我们突然会与其他团体进行交战。培训随战争开始。级别越高，培训就越多，因为你需要发令。我参加了培训。我知道什么是目标，什么不是。学校、救护车、医院显然都不是目标，所以我们告诉级别较低的士兵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攻击这些对象。你知道，在战争期间，你不可能控制每一个军官，但是你可以尽力去做。我们必须提醒他们，我们不是恶魔，我们是人。敌方也是如此。

“对我个人而言，原谅让我好过一些。有一天，我醒来以后就想：‘我想要原谅所有对我开枪的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永远不会。但是我会去尝试，去原谅他们，也许我可以将我亲手搭建的我们之间的隔阂拆掉’。”

*文中使用的是化名





1. 2015年5月至2016年7月之间。
2. 2010年至2015年间，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与冲突有关的死亡人数占全球的47%（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不包括2015年）。这一统计基于《日内瓦宣言》秘书处提供的数据。2015年。Global Burden of Armed Violence 2015: Every Body Cou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阻止武装暴力行动 (AOAV) 报告，2015年6月22日：Explosive States: Explosive Violence in Populated Areas in 2014 <https://aoav.org.uk/2015/explosive-states-explosive-violence-populated-areas-2014/>.
4. UNHCR, *Global Trends Report, 2016*: <http://www.unhcr.org/news/latest/2016/6/5763b65a4/global-forced-displacement-hits-record-high.html>, all web addresses accessed April 2017.
5. 根据2017年4月初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http://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database>)、联合国难民署 (<http://www.refworld.org>)、以及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https://www.unrwa.org/>) 提供的数据，目前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境内或境外约有1740万人流离失所。
6. 联合国难民署：http://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regional.php#_ga=1.255086920.1950945305.1484762757.
7. 也门有22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6年初步数据），预计人口2750万 (<http://data.un.org/CountryProfile.aspx?crName=yemen>)。
8. 伊拉克有33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6年初步数据），预计人口3750万 (<http://data.un.org/CountryProfile.aspx?crName=iraq>)。
9. Joanne Liu and Peter Maurer. “The airstrike on an Aleppo hospital is a wake-up call for the UN. It must act now”,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apr/29aleppo-hospital-airstrike-un-syria>.
10. 截至2017年4月1日的最新伤亡率统计。
11.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国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包括有关返回、重新安置和重新融合的第五节，以及原则28、29与30：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IDPersons/GPChinese.pdf。例如，原则28规定：“1. 有关当局负有主要义务和责任创造条件以及提供方便，允许国内流离失所者自愿地、安全地在保留其尊严的情况下返回到他们的家园或习惯住所，或在国内另外地方自愿重新定居。有关当局应设法便利返回或另行定居的国内流离失所者重新与社会结合。2. 应作出特别努力确保国内流离失所者充分参与计划和管理他们的返回或重新定居和重新融合。”
12. 根据上一次官方人口普查（2004年），有大约46.7万 (<https://www.citypopulation.de/Yemen.html>)。有预测估计，这一数目可能相比战争爆发前，已经翻了三倍。
13. 国际移民组织及联合国难民署人口流动联合工作组2017年1月起提供的数据显示，来自塔伊兹省的冲突流离失所者（54.7万人）要多于任何其他省。TPFM 12th report, January 2017, p. 1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6owQSRCTIGYQUI3MHZ-MN01RdEUview?usp=sharing>.
14. 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到的报告称。
15. 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11月6日。<http://www.emro.who.int/media/news/survey-reveals-extent-of-damage-to-yemens-health-system.html>.
16. 不顾国际人道法对于死者待遇的规定。See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v1_cha_chapter35.
17. 安巴尔省议会发言人，2015年12月31日：<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12/iraq-80-percent-ramadi-ruins-fighting-151231114030408.html>.
18. 截至2017年3月13日，拉马迪地区战争期间被迫流离失所的50多万人中，约30.05万人已经回归该地区。IOM Iraq Displacement Masterlist: <http://iraqdtm.iom.int/ReturneeML.aspx> 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Ramadi_\(2015%E2%80%9316\)#cite_note-bombs_laid-29](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Ramadi_(2015%E2%80%9316)#cite_note-bombs_laid-29).
19. 国际移民组织建立的流离失所跟踪模型。2016年10月，据计全国范围内约310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http://iraqdtm.iom.int/IDPsML.aspx>.
20. 在2017年2月19日伊拉克袭击摩苏尔西部之前，摩苏尔市人口据计有120万至150万，其中1月中旬（交战三个月后）逃离该市及邻近地区的人口据估计仅有20万。

21. 国际移民组织，伊拉克特派团流离失所跟踪模型：<http://iraqdtm.iom.int/EmergencyTracking.aspx>.
22. 2016年10月17日至2017年3月23日期间，35万人离开该市流离失所，虽然截至2017年3月23日，据计7.6万人已经重返：<http://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assets/IDUs/20170330-idu-issue-13.pdf>.
23. 战争期间许多现代城市都遭受围困，从列宁格勒到巴尔干地区（萨拉热窝曾遭围困近4年）。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各方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战争方式。出现了从部分围困到完全围困的不同形式，但通常一次持续数月或数年，给平民带来巨大后果。
24. 包括2017年4月9日可获得的有关国家的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6年初步数据(<http://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联合国难民署以及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数据。总数包括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统计的由于叙利亚危机而流离失所的40万巴勒斯坦难民。
25. 即，联合国伊拉克国别小组，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拉马迪市长以及伊拉克卫生部。
26. 国际人道法保护所有民用物体，尤其是对于平民居民维持生存不可或缺的那些物体。
27. 相关话题更多讨论，see ICRC, *Bled Dry: How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Bringing the Region to the Brink of a Water Catastrophe*, March 2015: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bled-dry-how-war-middle-east-bringing-region-brink-water-catastrophe>.
28. 此话题的深入分析，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期间的城市服务：呼吁采取更佳方法援助受影响人群》，2015年10月：<https://shop.icrc.org/icrc/pdf/view/id/2578>.
29. 欲了解更多信息，see: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explosive-weapons-populated-areas-use-effects>.
3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所面临的挑战》，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瑞士日内瓦，第31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于2011年10月由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编写，第42页。
3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强烈谴责在伊拉克摩苏尔地区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2017年3月3日：<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raq-icrc-strongly-condemns-use-chemical-weapons-around-mosul>.
32. 贝鲁特美国大学：<http://ddc.aub.edu.lb/projects/pspa/kisirwani.html>.
33. 虽然其原因不仅仅是战争遗留的问题，但直到今天，仍有四分之一的黎巴嫩国民旅居国外（520万人口中的130万），占半数的黎巴嫩青年在获得学位后移居海外。
34. 战争结束时，据估计国内流离失所人口多达50万，死亡人数在4.8万至25万之间。据计60万到90万人在战争期间逃离该国，其中许多在战时或战后回归。至2004年，黎巴嫩移民事务部称，国内仍有6.8万人流离失所，但是据其他机构估计，仍处于流离失所中的人口数目是这个数字的近十倍。
35. 皮卡尔博士是位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调查研究所负责人。
36.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Decision to Emigrate amongst the Youth in Leban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IZA DP No. 10493: <http://ftp.iza.org/dp10493.pdf>.

第2-3页照片：

2017年1月，阿勒颇老城。玩耍的儿童。

第72-73页照片：

如今沿着贝鲁特的滨海路骑行的人们。

使 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苦难发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1863年，它是《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该组织负责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开展的国际行动。

“I SAW MY CITY DIE”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urban conflict in Iraq, Syria and Yemen

 facebook.com/icrc

 twitter.com/icrc

 instagram.com/icrc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3-2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 3290

传真：+86 10 6532 0633

邮箱：bej_beijing@icrc.org www.icrc.org

© ICRC, 09.2017

